

中国发展模式是怎样“炼成”的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考察与思考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韩保江

摘 要: 本文在全面回顾中国 33 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机理,总结提出了“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发展模式、“渐进式改革”孕育中国发展模式、“善于学习”成就中国发展模式、“勇于结合”生成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特色”升华中国发展模式等五种形成途径,进而深刻揭示和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 中国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 渐进式改革; 善于学习; 勇于结合;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3)08-0003-18

改革开放 33 年来,中国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经济发 展奇迹。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路径,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因此,全面系统地回顾改革开放历史,深入地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机理,对于增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发展模式

1978 年,北京的冬天同往年一样,依旧是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寒冷冬天,却孕育涌动着着一股强大的暖流,它不仅

将彻底驱除过去那些让人感到窒息的股股寒流,而且将催生出让人激情澎湃的阵阵春潮。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提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要从 1979 年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响亮地吹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她向世界宣告中国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验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①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也就以其自己的方式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并在探索当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5 页。

应该说,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痛苦反思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教训的结果,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代表全中国人民做出的理性战略抉择。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因此学习和模仿苏联“老大哥”的体制和做法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苏联计划体制的特点是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计划一直管到企业和集体农庄,忽视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自主权,否认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的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9月指出,“从总体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①“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等捆起来了”。^②所以,“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③“文革”是一场浩劫,但由于它把“左”的路线推到极端,又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和人民。因此,“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

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④

改革传统体制,必须找准传统体制阻碍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症结。只有找准了症结,对症下药,改革才能迅速见到成效。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 and 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⑤进而通过“自主

① 《邓小平年谱》(一九四五—一九九七)(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4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权”的安排,进一步明确权、责、利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蓬勃地发展起来。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沿着“自主权(利益)——积极性(活力)——发展生产力(现代化建设)”的起始逻辑展开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根本拆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根基的条件下,这一逻辑一直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设计改革方案和选择改革路径的基本原则,从而也成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基因”。

围绕这一改革的初始逻辑,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取得突破。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而明确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实际上,在中国“包产到户”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农业生产高级合作化时候就早已出现过。但一直被当做“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到批判。因此,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对它始终心有余悸。然而,穷则思变。从1978年开始,安徽省的一些地方和群众开始探索实行包产到户。著名的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大包干”就是在此时搞起来的。^①这种“交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剩余索取权”由“集体”向“个人”的让渡,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立竿见影的好方法,当时也招致很多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认为“分田单干”是“倒退”,会破坏集体经济,影响社会主义性质。针对这些意见,1980年5月,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②

也正是有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纪要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同时指出“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③由于当时中国农村大多数是贫困落后的。因此,这个文件下发之后,包产到户、“大包干”发展的很快,到1980年年底,已从年初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1%发展到14.9%。1981年下半年以后,包产到户、“大包干”遍及全国,不仅贫困落后地区普遍实行,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地区也纷纷效仿,

① 包产到户是生产队把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畜、农具等固定给社员使用,劳动成果中包产部分由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分给承包的农户,生产队仍采取按工分分配的方式。“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略有区别,它是劳动成果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和其他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有,不再采取工分分配形式。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政策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而且大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联产承包的生产队占86.7%,1983年年初,达到93%,其中绝大部分是包干到户。^①

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冲破了严重束缚农民积极性的旧的经营管理体制,彻底摆脱了集中统一管理、集体劳动、否定分散经营的“大呼隆”和评工记分制度难以体现多劳多得的“大锅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1983年1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文件,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这包括:肯定专业化(重点户);对雇工经营作了规定;允许农民购置农机具;发展个体工商业和服务业,允许农民长途贩运;鼓励农民个人或合伙集资兴办基础设施。1984年,中央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1985年,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订购以外的可以自由上市。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对于这项重大改革,邓小平评价很高,认为是在改革上“迈出相当勇敢的一步”。^②同时,在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5年6月,全国完成了政社分设和建乡工作,从此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红红火火,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已悄然兴起。

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沿着改革的初始逻辑,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开始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而僵硬的计划一直管到企业,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企业的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生产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由国家统一调拨;财务统收统支,资金由国家拨,利润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这种体制严重地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开始,是客观要求。”^③

国有企业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曾经走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探索。起初是在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从1978年第四季度开始,四川省在江宁机床厂等六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显著效果。1979年试点单位扩大到100个。试点的办法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在完成国家计划后组织计划外生产;可以不经过物资、商业部门,自行销售他们不收购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可以用自有资金扩大再生产,等等。据统计,100个试点企业中的84个地方工业企业,1979年和1978年相比,总产值增长14.9%,利润总额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4%,普遍高于非试点企业。^④为此,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多个文件。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到1979年年底,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4200个;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这些试点企业约占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因此,邓小平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高兴地说“今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已经达到

①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274页。

② 引自《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③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页。

④ 《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载于《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第1期。

六千多个。这些单位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怎样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开始找到了门路。”^①

1981年春,山东省又率先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探索。一方面,政府采取行业利润包干、亏损企业包干和地区包干等盈亏包干;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则实行多种形式的计件工资制度,使职工收入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这种方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地方财政收入问题,而且进一步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在全国很快推广,原来的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也纷纷转向实行经济责任制。应该说,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质上都是扩大企业留利,给企业大小不等的财权,这就在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上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统收统支的局面。它的优点在于通过合同划分国家和企业的权责利,初步解决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同时,在分配上包死国家一头,完成上缴利润后,新增利润全部或大部分留给企业,使企业有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特别是职工工资、奖金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留利多少,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但它也有弊病,即包盈容易包亏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负盈亏的问题。特别是承包期短,容易导致企业短期行为,往往能保证上缴利润和职工福利,而不能保证企业技术设备改造更新,甚至采取过度消耗现有资产的办法来增加利润。由于价格、税收关系没有理顺,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确定承包基数只能是一对一的谈判,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尽管如此,作为改革初期的探索和过渡的办法,确实发挥了推动改革的历史作用。

也正是由于“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存在一些

不足,从1983年1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利税并存的第一步利改税,从此国有企业开始了“利改税”改革。即为了稳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保证企业能够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将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征税。1984年9月,国务院决定普遍推行第二步利改税,即由“利税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实行“利改税”的初衷是想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税收杠杆缓解价格不合理带来的矛盾,摆脱“条条(部门)”和“块块(地方)”对企业的行政束缚。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而这也就促使中国改革的设计者和领导者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体制内的微观改革,如果没有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的跟进,效果始终是有限的。因此,着眼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而探索建立新的经济运行体制的序幕开始正式拉开,谋求推进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战役也由此打响。

建立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关键是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加深刻地揭示计划体制模式的主要弊端,认为“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①从而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又作了新的说明,它放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形式与手段,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且提出利用市场调节不等于搞资本主义。最终认为新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这种新的改革理论指导下,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觉性和整体性都显著增强,商品化、市场化改革进程大大加快。

一方面,围绕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为重点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企业经营承包制的范围迅速扩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这几年城市改革的试验充分表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②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提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有些全民所有制的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可以由主管部门进行拍卖或折价出售。1987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普遍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具体经营承包的办法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这一做法推行很快,到1988年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承包面已经超过90%,其中大中型企业达到95%。经营承包制的推行,提高了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扭转了由于利改税导致平均利润下降的局面,确保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由于承包制的固有缺陷依然存在,加上企业外部环境不宽松,除少数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好以外,大多数企业效益并没有显著提高。到了90年代初,党中央总结了过去十多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生机和活力,不能只在企业经营方式上边来换取,必须切实抓住两个方面:一是改善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二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而后者是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根本。为此,国务院提出改善企业外部条件的12条政策,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另一方面,全面启动价格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价格体系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活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③据此,从1985年开始,不仅放开了除国家定购的粮、棉、油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③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0~571页。

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而且放开了部分计划外的生产资料价格,这样“就出现了生产资料价格由国家定价和市场调节价格并存的所谓价格‘双轨制’”。^①1988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除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外,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进行企业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传统“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也进行着深刻的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所有制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上,从1979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断然采取支持城乡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1981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在我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列为促进社会主义全面高涨特别注意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就这样,在各种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濒临灭绝的城乡个体经济又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成长起来。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更加明确地提出,要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因为“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

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③因此,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从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具备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不可否认,由于缺乏经验和系统设计,这一阶段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即由于旧的计划机制的作用逐步退去,新的市场机制没能充分发挥作用,由于体制转换“真空”而导致经济过热、物价涨幅过大、流通秩序混乱,以及“官倒”和“私倒”现象发生。由此,从1989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三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时期。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僵局。一方面,有人把肯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进市场化改革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继续坚持计划经济,扩大指令性计划;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坚信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结果。对此,邓小平在1990年12月也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④

① 苏星主编《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3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992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春天,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谈话”。在谈话中他不仅深刻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而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的《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概括我国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内涵。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②具体来讲,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1993年11月13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在总结党的十四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③

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有了这样一个比较清晰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后,就很自然地摆脱了在此之前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式的某些“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摒弃了长期把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元素作为“外生变量”机械式“塞入”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做法,从此开始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崭新阶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27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改革步骤更加从容,改革内容更加全面,改革力度更加增大。

第一,按照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经济的一般要求,自觉地去调整所有制结构,积极构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所有制结构。

一方面,紧紧扭住国有企业改革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牢牢抓住产权改革这个关键,坚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积极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199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以此为标志,国有企业建立公司制度的试点在全国正式推开。该方案提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公司制企业以清晰的产权关系为基础,以完善的法人制度为核心,以有限的责任制度为主要特征。”到1998年年底,全国共确定了近3000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试点企业在改革产权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进展:一是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找到了国有企业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的方式和从政府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的途径。二是企业经营机制有所转变,企业活力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有所增强。三是推进了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拓展了企业融资渠道,清晰了企业产权关系,促进了企业发展。四是初步建立起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进行了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企业管理及其内部制度建设有所加强。五是采取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六是在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分流富余人员和企业办社会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资减债等难点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因此,试点“加深了对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机制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可行途径及重点、难点问题,为在更大范围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十几年经验的总结,是改革认识水平的一次巨大飞跃”。^①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国有经济“点多、面广、线长”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重点推进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如何对整个国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就摆到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议事日程。早在1995年春,理论界就有专家学者提出,单纯提“搞活国有企业”不全面,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这个新观点不久就被中央决策层肯定和采纳。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1996年5月4日,江泽民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一般国有小型企业,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个讲话就为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更加明

^① 马建堂《30年巨变——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简要回顾与评述》,载于《学习与思考:国家行政学院第二十四期厅局级公务员任职培训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确地指出“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和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做出新的部署,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从此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但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又逐步认识到,光有“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原则不行,关键是由谁来主导和推动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由谁来代表国有股的权益,由谁来进行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为此,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相继指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从此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不再使用“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提法,这说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已经基本清晰。从2003年3月开始,国家正式开始实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1)撤销过去专司国有企业改革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及中央企业工委,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将财政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行使的部分产权管理、人事任免等职能划入国务院国资委;(3)将当时197家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划归国务院国资委,由国资委代表国家对上述企业统一实施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初步实现了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统一;(4)31个省市和部分地级单位也在2003

年年底和2004年上半年相继设立了对各自所有的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经过五年的努力,到2007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得到落实,出资人监管得到强化,很大程度解决了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进而有效地推动了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另一方面,积极改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环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发挥一切经济潜力、活跃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对促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市场经济发育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自身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改善,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它的竞争伙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党的十六大在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2005年2月25日正式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突出解决了其行业准入和公平服务的问题。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提出“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进一步强调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有了自己的重要地位,而且有了维护自己权利

的法律保障。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政策主张,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①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更加坚定地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②

第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是第一次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提并论起来,进而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为了“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第三,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制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一方面,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市场,逐步放开价格。1992年年底,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政府定价占5.9%,在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总额

中,政府定价只占12.5%,在工业企业销售的生产资料总额中,政府定价也只占18.7%。到1993年,全国基本上放开了粮食购销价。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其中特别重视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从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挂牌营业,到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全国性资本市场由此形成并初步发展。随后不断发展壮大,发展到今天,不仅真正成为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而且成为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第四,积极探索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的机制,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1997年,计划、金融、财政等部门间协同运用货币、财政政策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初步建立。同年4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同时,计划、金融、财政三家为建立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和投资计划等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也进行了积极地尝试和探索。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分别尝试采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松”、“双紧”或“松紧搭配”以及有保有压的宏观政策组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在养老保险方面,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失业保险方面,建立了面向城镇职工

①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于《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的失业保险制度,实现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障、企业补充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障等多层次的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普遍推广。城镇和乡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

如果说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是通过不断革除旧的体制顽疾,增加新的体制基因而实现体制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得以不断推进的主要力量除了来自“改革的自我强化机制”,还有一个重要力量,那就是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而释放出的开放的示范、牵引和逼迫效应。

讲对外开放的“示范效应”,是指对外开放让中国人了解了世界,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认识了市场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最先迈出两大步:一是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优惠的政策;二是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采取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形式,吸引外资。特区成立后,由于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焕发了这些地区的发展热情,经济发展神速。以深圳为例,原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到1984年,已经成为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的现代化气息十足的工业新城。这一年的1月至2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他对特区的发展成就十分满意。回到北京后,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①

随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

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所以,1983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政策。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并作为经济特区;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了北自大连、天津,南至上海、广州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央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带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在这样一个地带,不仅生成了新的发展观念,而且孕育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胚胎。经济特区,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成为内陆广大地区了解世界和认识市场经济的主要窗口,进而成为诱导内陆地区实施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对外开放的榜样。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把“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开放经济”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加以肯定。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这都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信心与决心。

讲对外开放的“牵引效应”,是指通过对外开放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产生有效的牵引和促进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启动的重返关贸总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协定的“复关”谈判,到2001年11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始终都得益于这一融入进程过程中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对接。通过争取加入只有市场经济国家才有资格成为成员国的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使我们真正熟悉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元素,而且使我们得到了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外在动力。随着“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逐步形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从国际交往和开放实践中汲取营养,进而成为一种日臻完善并被国际认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讲对外开放的“逼迫效应”,是指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自己的内在动力,但离不开开放对中国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有力“逼迫”。改革开放前的29年,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接受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无市场”的观念教育,特别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进而形成很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锁定”效应。如何打破旧体制的锁定和束缚,如何摆脱旧体制的“路径依赖”,“需要改革”的内在动力是重要的,但“必须改革”的外在压力就更重要。应该说,

不断深入的对外开放,给中国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压力”,它逼迫我们“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抓紧改革”。因此,我们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开放来实现的。

总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诞生于30年持之以恒、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诞生于30年持之以恒、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和大胆借鉴。是不断尝到的改革开放甜头诱致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是不断的改革开放深入坚定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不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成就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发展奇迹”。

二、“渐进式改革”孕育中国发展模式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力而要改革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明确“发展生产力”是改革选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唯一标准。只有“标准”唯一,行动才能果断,改革才能彻底。因此,邓小平引用民间谚语道出了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方法,那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①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探索改革的决心和热情。有了这种“理念”,还必须有合

^① 1961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华东局农村办公室的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多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黑猫、黄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接见青年团干部的时候,均讲道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且,引用了刘伯承同志常说的那句著名的四川民间谚语“黑猫、黄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文革”期间,“猫论”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成为对“姓资”、“姓社”的评判标准。20世纪80年代初,薄一波曾问邓小平,“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1985年,邓小平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由此,“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尽而成为了中国改革创新的最有力的“观念指导”。

理的改革路径。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还鲜明地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这种“摸论”的试验理性与“猫论”的唯一标准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推进改革的特有方式,即后来被理论界命名为“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是相当于叫做“休克疗法(Big bang)”的“激进式改革”而言的。后者是指通过迅速而猛烈的终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步到位地实现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方式。这种改革以俄罗斯、波兰和捷克这样一些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代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仅有效地避免了东欧式的社会经济震荡,极大地降低了体制转型成本,而且通过“试验”过程中的“边干边学”,最巧妙地把市场经济的“优秀基因”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进而极大地激发了蕴藏在中国社会当中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的体制改革选择“渐进式”的方式,自然有其特殊的道理。一方面,实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谋求建立一套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前无古人,无经验可循。加上经典作家们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水火不容”的理论论断和我们自己长期形成的“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念桎梏,所以谨慎前行、理性试验、知错就改、循序渐进就成为中国推开改革开放大门并不断深入,进而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制度大厦的重要途径。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

作中分析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特别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对未来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商品货币关系将随之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明白,他说: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③也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先验的理论认识,所以后来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中国作为一个以苏联模式为学习榜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很自然地也选择建立了一个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进而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国情也决定了其体制改革“渐进性”。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诸多弊端,多少都带有某些封建主义的色彩,要摆脱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的束缚和阻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例如,要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往往遇到自然经济中形成的“自给自足”,“大而全、小而全”,“万事不求人”的封建小农意识的影响;贯彻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往往会遇到“不患寡而患不均”、“劫富济贫”的小生产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干扰;要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往往会遇到家法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作风的阻碍;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行“能者上、庸者下”,往往会遇到等级观念、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家族观念等封建意识的抵触。因此,改革不可能不循序渐进。只有不断用改革的成果证明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才能不断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和舆论氛围。

同时,改革需要人才、需要经验、需要理论。由于我们多年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经济,自我封闭发展,所以我们缺乏懂得价值规律、熟悉市场经济和了解国际经济的干部和管理人才。正像毛泽东早就指出的那样,“路线确定之后,最关键的是干部”。干部“本领恐慌”和管理人才素质低下,不可能胜任“推陈出新”和驾驭复杂改革发展局面艰巨任务。然而,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干部和人才素质需要时间,因此,在人才资源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边干边学、引进消化、总结提升的方式,总结经验、创新理论、培养人才、提高能力。其中,特别是改革必然会涉及权力分配、利益调整和机构撤

并等问题,因此也必然招致利益受损者和认识不到位的干部群众的反对或阻挠,进而由此导致社会冲突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考虑社会与心理对改革和发展的承受程度,切不可急功近利。这正是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也正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用改革的成果教育群众,让群众在改革成功中自觉,中国的改革才能最终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进而取得改革成功。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最首要的特征是,表现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曾明确地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①这种质朴的理念也成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导中国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

讲到尊重群众创造,首先不能不提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包产到户不仅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先河,而且最先让最广大的农村群众和整个中国人民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与好处。然而,包产到户的发明权并不是什么圣明的领袖,而是最普通的农民,是由著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几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而大胆开始尝试的。这一尝试,不仅破解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没有解决如何去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难题,而且找到了中国人如何才能养活自己的出路。因此,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其次不能不讲改革开放初期最先尝试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私营经济的老百姓。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业精神,不仅证明了商品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而且在体制外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胚胎”和重要的制度元素。试想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基层老百姓盯住“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投机倒把罪”等政治压力去积极尝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如果没有东南沿海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星星之火”,就没有今天呈现“燎原之势”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巨大作用,就没有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因此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中国发展模式的魅力。

再次不能不讲地方政府的大胆尝试和自觉创造。中国的改革经验许多都是地方政府创造出来的。试想没有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大胆的市场化改革实验,就没有今天对市场经济理所当然的认同和接受。没有山东诸城等地尝试的“股份合作制”,就没有后来“抓大放小”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也就没有今天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第二个鲜明特征是,从“点”到“面”,上下结合。先行“试点”,然后“扩面”,是中国改革震动小、效果好的重要经验。关于中国的改革如何推进,邓小平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试验。”^①因此,无论是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

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甚至对外开放,都是从“试点”开始,试验成功后再面上推广的。用这种方式推进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就是通过“试点”去认识改革、创新改革、接受改革,同时把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从“点”到“面”的改革虽然呈现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进而有效地克服了“自上而下”强制性休克疗法改革由于信息不足和经验缺乏而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进而发挥中央政府的“权威效应”和“规模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很难全面地推动和展开。一方面,中央允许和鼓励各个地方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②另一方面,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中央也不遗余力地去积极推进关系改革全局的重要领域的改革。比如,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攻坚改革、分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等收效明显、关系全局的改革都是中央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主动推开的。因此,自上而下的领导推动和自下而上的主动创造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构成了推动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崭新动力。

第三个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促进了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其不断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科学认识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这从我们选择市场取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改革轨迹中可以清晰看到理论创新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贡献:首先是提出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愿或不敢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改革实践主要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上开始并逐步展开的,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这些地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薄弱,所以也就为市场经济体制因素的萌芽和成长创造了条件。其次是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1984年前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功,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逐步成长,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实践呼唤理论创新。因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第三是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党的十三大在承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法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了它的新经济运行机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此,结束了“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第四是重提“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前后,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稳定,对市场的认识出现了反复,重新强调政府行政控制和直接计划调节,重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重新得到强调。第五是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南巡谈话终结了喋喋不休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无谓争论,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著名论断。因此,党的十四大鲜明地提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进而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六是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新任务,清晰地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轨迹。从此不难看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推动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不断深化的改革实践又不断驱动着中国的理论创新,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进而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又一主要旋律。

第四个主要特征是,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科学把握好改革力度。关于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重要性,邓小平都分别作过强调性的论述,讲到改革,他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讲到发展,他说“发展是硬道理”。讲到稳定,他说“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这三方面的论断,构成了中国选择改革方式和路径的约束条件。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考虑,进而选择一种比较温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应该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我国现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彻底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就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发展是中国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强大和人民共同富裕,唯有加快发展。维护稳定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没有稳定,中国将重新陷入混乱、倒退和分裂,不可能搞好经济建设,不可能深化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程将毁于一旦。因此,无论是改革方式的选择,还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不能贸然行事、急于求成,必须考虑是否有利稳定和发展,尽量避免大的矛盾冲突和社会动荡。也正是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注意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进而使我们既避免了不少转型国家出现过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剧烈震荡,又使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三、“善于学习”成就中国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就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骄人经济发展奇迹,还得益于中国自始至终都抱定的“善于学习的态度和自我修正的精神”。学习资本主义,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成为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重要途径。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抱定了向外国学习的思想。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格奥尔格·内格韦尔为团长的前西德新闻代表团时就鲜明地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胆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①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又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重申“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的观点。^②随后,他在1979年3月21日会见以马尔科姆·

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又强调“我们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可以学会。”^③也正是从那时起,敢于学习、善于学习,成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就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

讲善于学习,首先是要善于向外国学习经验,准确地说是善于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取经。这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左”思想禁锢多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本身就需要勇气,需要胸怀。它不仅隐含了到底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隐含了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这里讲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就是讲要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和僵化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解放出来,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进而把探索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④

然而,要创造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当中,有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制度营养”,进而自觉地向当代资本主义学习。对此,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

① 《邓小平年谱》(一九九五——一九九七)(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39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一九九五——一九九七)(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④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页。

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①向当代资本主义学习,并不是鼓吹要搞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许多属于人类共同财富,并有利于发展现代生产力的财产组织形式、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创造了许多属于人类共同财富,并有利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制度框架。其实,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贡献,马克思也从不回避。他指出,与封建主义的小商品生产相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所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社会化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

无疑,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对此,列宁也早就鲜明地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③邓小平在1984年6月21日会见缅甸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部长吴吞丁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制度。”^④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及其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而

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甚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所以,无论是物质基础条件、生产力水平状况,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那个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态应具有的水平,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努力成为能够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当代资本主义,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对此,邓小平科学而实事求是地指出,要敢于承认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有先进和可供学习的地方。他在谈到如何加快改革步伐时指出,社会主义中国有许多优越性,应当保持。但是,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果,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好一些。人家有长处,为什么不能学习和利用呢?“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⑤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认识,中国的改革始终是与开放同步,并把学习当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某些制度文明,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手段和促进力量。

事实上,从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来看,比较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吸收和借鉴比较先进的民族和国家的文明成果,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④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要自觉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要积极吸取和借鉴与我们可能长期并驾齐驱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法治框架和民主制度,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努力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能够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只有站在“发达资本主义肩上”发展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比资本主义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讲善于学习,另一层含义就是要及时总结国外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深刻教训,避免改革走弯路、入歧途。实际上,早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开始了体制改革的探索。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日益暴露出的不可克服的弊病,南斯拉夫最早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提出异议,率先进行了改革。当时受到苏联的压制和批判。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在理论上逐步冲破苏联模式的禁锢,在实践上也开始了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经过长期曲折的过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成为人们的共识。”^①然而,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采取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导致苏联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些国家的教训,很自然成为中国选择改革方式和体制模式的“活教材”。也正是这些惨痛教训,坚定了中国走自己的改革道路的信念和决心。

讲善于学习的又一层含义,是科学地看待自

己,吸取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敢于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科学地看待自己,就是要认清自己的长处与弊端。对此,邓小平在1982年7月就早已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②因此,如何既能保持和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又能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而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就自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选择目标模式的逻辑起点。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认识逻辑,谋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基因”和市场经济“优势基因”的有机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

吸取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敢于否定自己,修正自己,就是要善于从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敢于承认自身的缺陷和失误,通过不断修正自己,实现自身的优化。事实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小革小改”和计划经济体制外的市场经济元素的自然发育,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创新;从承认个体私营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到承认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特区式的“点开放”到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经济新格局,等等,无不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学习精神和纠正错误的理性。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性,造就了中国自己求真务实的改革风格。也正是这种风格促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框架和发展模式。

① 苏星主编《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四、“勇于结合”生成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发展模式可谓聚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精华,集东西方体制之优势。也正是如此,中国发展模式释放出了任何一个“单纯”体制所无法比拟的生机和活力。而这种“中西合璧”的发展模式恰恰应该归功于中国勇于进行“体制嫁接”,不断谋求“优势结合”,着力建设“混合经济体制”的努力。正像邓小平早在1980年设想的那样“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①

于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和体制是什么样的呢?邓小平在1980年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曾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②也就是说,当年邓小平设想,如果能够通过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进而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势互补,那就能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会成为好制度。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好制度,邓小平极力地教导人们要从教条无谓的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中解脱出来,大胆进行制度创新。

首先,勇于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嫁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邓小平早在1979年12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等人的时候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③从那时起,中国的改革就主要体现在不断向计划经济体制内加入市场经济元素,进而不断削减计划经济元素,最终整体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计划与市场“板块式”的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计划与市场“交融式”结合的尝试(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最终都是想真正构建起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双重优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在两个难点上取得突破:一是如何让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二是如何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进而实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良性互动。

围绕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的难点,中国大胆进行了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在所有制结构的层面,积极建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自然分工”,使公有制经济尽量在非公有制经济不愿进入的公共经济领域和限制非公经济进入的少数关系国家安全的命脉经济和自然垄断行业去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在公有制本身的层面,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能否找到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不仅关系到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及其存在的历史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和性质。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中,股份制是主要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一九九五——一九九七)(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1页。

形式。股份制是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它实现了出资人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相分离,进而使不同所有制更加广泛和多样化的资产融合成为可能。因此,国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通过股份制改造,进而真正转换经营管理机制而融入市场经济。股份合作制作为公有制的另一种实现形式,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的新创造。它把股份制和合作制有机结合,实现了“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内在统一。因此,它成为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的实现形式。

围绕如何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难题,中国建立了一套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除了继续使用计划、规划等调控手段外,更加重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除了继续使用行政手段外,更加重视使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留出充分的空间。

其次,勇于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构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初次分配制度。同时,坚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通过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不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选择。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孤老病残者除外)不仅是实现效率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但是,从价值创造和财富形成的角度看,劳动的特殊贡献是无疑的,但还必须看到劳动之外的其

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如果只强调劳动的稀缺性和贡献,看不到“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贡献,甚至把这些要素的价值体现简单异化为“剥削”予以限制和反对,那么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快速发展,财富就不能有效创造,社会就不能实现进步,人们的生活就不能真正改善。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理性地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鲜明地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思想,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通过有效借助国家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兼顾效率与公平,而且可以有利于形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的良好局面。^①

再次,勇于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和私人投资、外商投资等私人资本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股份制经济或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经济。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或公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推动其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国有或公有产权的流动、重组,优化资本配置,提高运营效率;有利于依托多元产权架构和民营型的运营机制,增强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的运营效率;有利于减少不同性质资本之间的相互侵害,增强国有资本对其他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最后,勇于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

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发展起来,既离不开世界,离不开经济全球化,更离不开独立自主。这样的结合,使我们能同时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趋利避害的平等竞争中达到互利、普惠、共赢。

也正是这些“结合”,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具备了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又使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比较优势得到的保留,由此形成了独具魅力、优势鲜明的新经济模式。

五、“中国特色”升华中国发展模式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体制作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制度,其本质是以市场机制(利益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实现效率提高和财富增进。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地区采用市场经济体制,都不能偏离这个本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不同国家、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其领导集团也会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这些都会在经济体制上打下烙印,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对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归纳总结出了三种“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美国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法国和日本的以行政管理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德国和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除此之外,比较受关注的还有东南亚市场经济模式、拉美市场经济模式、印度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市场经济模式等。

在三种“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中,美国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备受关注,因为它的“自由企业制度”和“受限政府”,推动了美国二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和近十多年的经济繁荣。日本、法国、德国和北欧国家以行政管理为导向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但由于经济自由度不

够或者社会保障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其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这些国家近年来的改革也基本上以“放松管制”或“经济自由化”为主要取向。

东南亚市场经济模式、拉美市场经济模式、印度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市场经济模式,由于普遍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经济学家把这些模式称为“权贵市场经济”或“买办的市场经济”。这些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对资源配置过于强大的影响和对经济运行过多的规制,由于这种影响和规制主要来自于“非受限政府”,所以很容易导致不当倾斜和“权钱交易”,使发展速度受到抑制、金融系统被严重侵蚀、社会不公不断加剧。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称“新兴市场的转型过程可以看出,对准入监管更多的国家,腐败和地下经济就越严重。”

因此,鉴于国际上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模式的经验和教训,鉴于国际上通过“法治”来建立“受限政府”和“放松管制”的潮流,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和特色,建立自由发展、平等竞争、有限干预的“法治”市场经济,是必然选择。

首先,“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关于经济自由的意义,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总结欧美国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人均收入是与经济自由——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职业自由,租用资源并以增加产量或降低成本的方法将各种资源结合在一起的自由,进入某些行业并与已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的其他企业竞争的自由的增加密切相关的。”“我们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致性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

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①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脱胎于带有显著的“中央集权和家长专制色彩”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经济自由”的制度惯性依然很大,许多人甚至仍然害怕和忌讳“经济自由”。所以要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摒弃旧体制的惯性思维,通过限制政府干预,给各类经济主体和生产要素主体留出更广泛的“自由选择 and 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要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必须抓好三个层面的基本制度建设:(1)尊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假定。“经济人及其利己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发挥“魔力”的前提。如果各类经济主体没有“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愿望(或努力)”,^②市场通过“利益”配置资源就成了“对牛弹琴”,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会荡然无存。正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所言“追求私利的人类利己本能乃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它是引导全社会的生产和繁荣的原动力”。^③(2)独立的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制度前提,是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制度源泉。因此,必须保证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尊重企业自主的选择,把企业打造成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3)有效的财产权保护制度。有效的财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有利于资源的有效使用,而且有利于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各类经济主体获得稳定的发展“预期”,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

热情和欲望,进而推动经济繁荣。因此,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强调,所有权或产权是资源稀缺的反映,没有产权保护资源就会被滥用,“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一部所有权法的存在又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如果保护公共财产不被私人滥用是必要的,那么,保护私人财产不被滥用同样也是必要的。因为“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所有权都是一种得到承认的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取得进步,因为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改善他们所生活环境的动机。”^④

其次,“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正义”的要求,是“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前提。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梅尔斯特所言,在市场经济社会,只有良好的“正义”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才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的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再次,“有限干预”,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但政府干预的目的和空间在于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干预行为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依照法定的程序来进行。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备一般市场经济的上述基本要求的话,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特殊性”,即中国特色。突出中国特色,并不

①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和第176页。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4页。

③ 转引自新开长英《市民社会伦理の成立》,东京,理想社1976年4月第1版,第81页。

④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0页,第94页。

只是为了“刻意”有别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因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模式都必然带有其民族和文化的烙印,都要反映其执政者的“价值追求”,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有所差别是必然的。我们这里讲要突出中国特色,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中确实有其独特并使其有别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早在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照搬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①1994年12月江泽民也曾明确地指出:“我们搞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有些人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搞市场经济好啊,可是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国外一些人也提这种问题。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看惯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也希望中国照他们那个样子去搞。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②

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表现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

基本原则。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根本体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物质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前提。虽然从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换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竞争关系,它们之间不应有高低主次之分,但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应该有所区别。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有利于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特别是通过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军工行业、公共产品、支柱产业等领域的集中,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安全保障,进而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如此合理分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就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建立在“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具发展活力。

其次,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始终占主导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③应该说,这两条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着,也正是坚持了这样根本的两条,才使得我们的改革不仅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且由于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开放的实惠,而获得

① 《邓小平年谱》(一九九五——一九九七)(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②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支持和拥护。注重社会公平和实现富裕,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不仅始终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魅力所在。但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是以物质产品相对丰富为前提的。我们曾经在旧中国经历过由于贫穷和两极分化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民不聊生,也吃过在旧的计划经济和“左”的年代不讲生产力发展而追求所谓“平等”,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苦头。因此,要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必须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倡导和保护效率,注重和维护社会公平,妥善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合理的分配差距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并赖以生存的根本。对此,列宁早就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①因此,针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后,我们开始注重效率,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这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只有坚持效率优先,把竞争机制和差别机制引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让劳动者的收入报酬与他们的劳动贡献挂钩,让经营者的收入报酬与他们的经营业绩直接挂钩,让投资者的收入直接与他的生产要素投入状况直接挂钩,让企业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进而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

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和分配理念,进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经营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及要素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要社会公平,不注重共同富裕。针对由于劳动者先天的能力差异、劳动效率与要素贡献不同而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我们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与政策。在分配政策的取向上,党的十四大把“兼顾效率与公平”写进报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又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指向。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特别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仅仅“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不够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更加明确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新论断。并且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高收入,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建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党中央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针对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党中央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加大了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帮扶力度;针对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一方面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物业税等适当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各种转移支付,保证社会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稳步提高。由此逐步找到了一条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利益调整的新路径。

第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既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传下来的宝贵制度遗产,也是中国发展模式得以卓有成效的体制关键。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要维护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命脉行业、瓶颈环节有所突破,为此就要举全国之力,统一领导,重点投入。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独立,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五六十年代的“两弹一星”、七八十年代的宝钢、八九十年代的“三峡工程”、再到进入21世纪后的青藏铁路、探月工程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无一不是通过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完成的。也恰恰是在这些重点领域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


速发展。然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条件:一是共产党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实现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前提。二是公有制为主体是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基础。其中特别是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这就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推进和低成本建设创造了条件。三是群众拥护和民心所向。许多重大工程是为了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而开工建设,因此这些重大工程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参与,进而成为强国富民的“民心工程”。

第四,重视宏观调控,坚持科学发展。如果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宏观调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就是应有之义。党的十四大在初步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架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所以这样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和经济波动需要宏观调控,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看到的;另一方面就是宏观调控是维护国家大局、实现中央政府意志的重要手段。如果说西方的宏观调控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事后性”的话,中国的宏观调控则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前瞻性”。也正是如此,中国不仅非常重视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来保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而且利用宏观调控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谋求和平发展。中国

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不断深入的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但是,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平。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通过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不仅赢得更加广泛的发展资源和发展空间,而且使中国的发展模式赢得了世界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第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把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概括为“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这种概括尽管有些简单,但却道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根本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伟大成就。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关键时刻,邓小平都明确地强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①“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③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邓小平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④的确,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也正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最终才找到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找到了加快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繁荣和人民富裕的康庄大道。

①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6 页。